

《声音》系列之一 NONGMIN

从著名专家到普通农民的专访

农民！农民！



周原 主编

花城出版社

《声音》系列之一

从著名专家到普通农民的专访

农民！ 农民！

周原 主编
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农民! 农民!

周原主编.

-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4. 5

(“声音”系列丛书)

ISBN 7-5360-4329-5

I. 农 ...

II. 周 ...

III. ①农业经济 - 研究 - 中国②农村经济 - 研究 - 中国③农民 - 问题 - 研究 - 中国

IV. F32D422.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29290 号

责任编辑: 林贤治 张 懿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

装帧设计: 林露茜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(南海桂城叠南)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9.375 1 插页

字 数 210, 000 字

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8, 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360-4329-5/F·61

定 价 1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总序

七十七年前，鲁迅在香港做过一个讲演，题目叫《无声的中国》。他对青年说，要将中国变成一个“有声的中国”；又说：“只有真的声音，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；必须有了真的声音，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。”鲁迅没有孤立地看待中国问题，他把中国的改革纳入到世界的文明进程之中，表现出了一种宏阔的开放的眼光。中国的现代化过程，在一定的意义上，也可以说是从无声到有声，从窃窃私语到众声喧哗的过程。

为此，我们编辑了一个图书系列，名字就叫《声音》。

这是改革的声音。一场历史性变革，势必涉及政治、经济、法律、文化教育、宗教习俗、伦理道德等广大领域，新与旧的冲突，必然引发许多前所未有的社会现象，而原先存在的问题，也将因此渐次浮出水面，或者变得更为突出，如“三农”问题，失业下岗问题，国民权利平等问题，城乡差距及贫富差距问题，弱势群体问题，社会福利问题，政府职能的转变问题，教育问题，青少年犯罪问题，环境保护问题，等等。《声音》立足于改革的前沿，其系列将分别延伸至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层面，而凝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声音。

整个系列图书采用“对话”的形式。在西方，早在苏格

拉底时代，这一话语形式已经作为追寻真理的一种方式而盛行。柏拉图的对话集是著名的。我国的先秦诸子，同样留下了大量的对话体文献。对话的双方，可以各自保留独立言说的空间；而由问答营就的语境，既互相面对，互相对峙，却又互相生发，互相推进。在这里，对话体的使用，是编者自觉秉承了这一传统，以推动思考的进一步深入。

对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，我们从来习惯于倾听上层的意见，专家学者的意见，而忽略基层的意见。其实，改革是大众的事业，它的命运跟每一个人的痛痒相关，因此人们不但有表达他们的意见和权利，而且由于这些意见直接而忠实地反映了被称为“沉默的大多数”的利益、愿望和要求，从而带有很大的比重，理应受到足够的重视。《声音》除了采纳专门家的话语以外，尽量融入普通民众的话语，正在于体现这个基本的立场。

对话是呈现的、开敞的；对话也是一种“绵延”。书中的对话者各各描述他们的见闻，表达他们的理念和观点，而所有这些，未必是完全真确的。他们提出各种问题，却未必一定有现成的答案，而作出的解答，又都未必一定是完善的。好在这里是一种平等的交流，可以互相补充和纠正。而且，作为一种“声音现象”，读者仍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判断，对此予以肯定或批评。

伏尔泰说：“我虽然不同意你的意见，但我誓死拥护你说话的权利！”希望系列《声音》，成为广场的声音，大众的声音，彼此呼应的声音，共同探讨的声音。这是理性的声音，也是令人感动的声音。它鸣响着进入时代的腹部，响应着我们每个人的脉跳：它来自社会大大小小的角落，但也终将回到那许多喧闹的和偏僻的地方。

前言

周原

中国，被社会学家称为“乡土中国”。要认识中国，必须认识乡土；也可以说，不认识乡土，就不可能认识中国。

近几年，“三农”——农民、农村、农业——问题被推到了一个十分突出的位置，称为“重中之重”。专家学者怀着极大的热情，从不同领域和不同角度给予多方位的解读；其中部分的研究成果，得到中央政府的采纳，并成为制订农村政策的重要参照。但是，农民的生存状况至今并没有很大的改善，城乡差距持续拉大，农村形势依然十分严峻。在全国率先改革的道路上，农民开始寻求现行体制的新的突破点，与此同时，发出了有别于专家学者的声音。

本书采用访谈的体例来构建。所选个案，都是在改革大背景下的有关“三农”问题的典型视点。其中，涉及制度创新、新乡村建设运动、乡镇选举、组织与维权、税费改革、脱贫、文化教育、医疗卫生等诸多方面，涵盖面很大。采访对象则有官员、专家、农村实际工作者，直至普通农民；在相关的内容而言，他们都是著名的或是有代表性的作者。通过这种权威性聚焦透视，对于我们来说，复杂的“三农”问题就变得明朗许多了。

开头两篇可以看作是整体性的改革方案。李昌平提出“农民

真苦，农村真穷，农业真危险”的论断而一度成为新闻人物。在这里，他着重分析了农民致贫的体制根源，揭示“破题”所面临的一些刚性的壁垒。温铁军以田野调查所积累的经验，结合亲自考察世界30多个国家的状况，从比较研究中，就农村发展问题发表了系列独到的见解。杜润生作为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元老，着重谈论土地制度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，以及“农民组织化”问题。于建嵘以他的实地调查考察，阐述农民自身的组织力量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。高战的新农协，试验的意义是明显的。被撤的村官王华以他所遭遇的尴尬，呼吁基层民主的建设和法律的保障。农民杨云标四次上访未果，却矢志不渝地倡导“理性维权、文化启蒙、科学致富”的理念。李凡强调制度建设是关键，谈了农村许多具体的制度改革问题。英名远播的高耀洁，以七旬高龄而屡陷危地，她揭示的农村爱滋病蔓延的情况令人触目惊心，而她个人的献身精神，在访谈中尤为感人。孙恒以艺术的形式反映进城农民的生存状态，在都市中努力建设农民工的心灵家园。殷永纯点燃他的青春和理想，支撑困顿的乡村教育。他们的存在，见证了诸多缺席，具有极大的精神感召力。关于西海固和定西两地的文化教育，在夏榆的采访中有着很详细的报导，那种贫困落后的状况，实在催人泪下。而吴栋材谈及的张家港永联村，却又是一番天地，作为一个业已超越贫困的个案，肯定会给我们带来一种全新的思考。

全书从个案出发，既有理论探讨，又有实况调查，争取做到有理有据；此外，还增加了若干相关的背景材料，以利阅读和思考。总之，这是一部严肃的书、沉重的书、灼热的书。济慈有诗曰：

谁也别想篡夺这个峰顶
除了那些把世界的苦难当作苦难
而且因此而日夜不安的人。

如果书中的声音,能够使我们的读者为之倾听,为之动容,为之感奋不已,并且因此生出一点担当精神,为广大的乡亲父老做上哪怕是一点什么,作为编者,也就足以自慰了。

目录

1 / 总序

3 / 前言

001/ 李昌平

农民的贫困：土地、权利、自由发展

031/ 温铁军

三农问题：非不能也，而不为也

061/ 杜润生

让农民建立起自己的组织

075/ 于建嵘

让农民自己说话

097/ 高 战

回归常识

117/ 王 华

在法律缺位的背后

137/ 杨云标

民间力量管理民间

161/ 李 凡

制度建设是关键

182/ 高耀洁

艾滋病在农村

201/ 孙 恒

因为我们无声

220/ 殷永纯

孩子们勾走了我的魂魄

243/ 彼埃尔—阿斯基 白菊花 马燕

西海固的爱与疼痛

260/ 师 欣

农家女漫漫扫盲路

277/ 吴栋材

醒过来，往前走

李昌平

李昌平，湖北人，经济学硕士。1983年1月至2000年9月，先后四次担任乡镇党委书记、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，经历了人民公社以来的农村改革全过程。2000年3月，致信国务院领导，指出“农民真苦，农村真穷，农业真危险”，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，被称为“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”，2000年9月辞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乡党委书记职务，南下打工；10月呼吁给农民以同等国民待遇；12月当选《南方周末》年度人物；后加盟《中国改革》杂志社。2003年9月起，任香港乐施会(Oxfam Hong Kong, 民间公益组织)西南项目官员。2002年1月和2004年1月，分别出版《我向总理说实话》和《我向百姓说实话》。

在这次采访中，李昌平把三农问题同体制问题联系起来，考察了现行体制的若干缺失，提出“推动农村由官本位向民本位体制的转变”的问题，把采访定位在制度创新的主题上。



农民的贫困： 土地、权利、自由发展

被访者：李昌平

访谈者：周原

采访时间：2004年2月15日

采访地点：北京—贵州

李昌平

农民的贫困：
土地、权利、自由发展

自身立场

周原：年前您在北京的时候我们没来得及把访谈做完，约定年后您从昆明回京后继续，可是时间一改再改，现在您又到了贵州，马上要到山里去，手机不通，也没有固定电话，我们只能现在在电话里谈了。

李昌平：真是抱歉，让你一等再等，我也想早点了却这件事，可是工作计划有变，我也实在没办法啊。

周原：没事，我理解。我

看了您发在2004年第一期《中国改革·农村版》的《扶贫日记》，写得很好，非常有感情，从心灵和感情上来说是对以往生涯的延续吧。从您辞去湖北的固定职业，漂流到南方然后又北漂到京城，现在又到了一个NGO组织，一段时间内要呆在昆明，在这些辗转的过程中，您感觉有什么区别吗，有没有比较大的不同？

李昌平：嗯，大体上差不多吧，思想还是一样的，就是一个贫民、一个穷人的视角嘛，只有从这种视角，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。否则，就没有办法作出价值判断，也不可能这样写。

周原：您是说您感同身受，设身处地，写他们心里要说的话。2004年1月31日您发在网上的文章：《社会进步是靠精英的吗？》，可以看作是这种立场的宣言吧。

李昌平：对。我是反对将人分成等级的，反对人与人享有不同的权利。“社会进步是靠精英的”这种观念，在中国追求民主、法制的知识分子中有很大的市场，说明这些人的骨子里还是封建专制思想。一个民主法制的社会应该靠“保障人人享有平等权利的制度”，才能建立起来。

周原：前一段时间我在明圆学校，与孙恒和他的农民工艺术团在一起，感触非常深。“我劳动，我快乐”，这么纯净的感情，还有他们彼此之间的互相爱护、扶持，对疲惫的心灵的眷顾，使我也得到休养生息。他们的资料中记录了您和乐施会、中国工合的帮助，您在《我向百姓说实话》中也提到他们。

李昌平：我也是从一接触他们就接受了他们，有一种非常

亲切的感觉，那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啊，是我们内心的需求，就像我在书中说的，他们歌颂劳动、团结、合作、法制，追求平等、自由、人权，代表了先进文化及其前进的方向。所以当认识他们之后，我就帮他们找资源，尽管当时他们的规模还很小，也不很规范，到现在发展到这个规模，他们付出了很多努力。其实我也没有很高的认识，只是一开始接触这种形式的文艺，就本能地感觉到应该帮助他们。

周原：您觉得是帮他呢，还是帮自己？

李昌平：从一个演出团的角度来讲，是帮他们，他们是主体嘛，但是帮助他们也就等于是在帮助我们自己，因为这也是我们内心的一种需要。

周原：就好像孙恒纠正唱青海民歌的魏彦博说的，不可能人人都当老板，但是不管我们多穷，都要争取像个人一样活着。

李昌平：对。

农民自杀

周原：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，我国每年大约有28.7万人自杀（见2003年11月21日《中国青年报》），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。比较集中的有2002年的湖北七起农民自杀事件，还有2003年7月的陕西省旬阳县桐木乡涌泉村三个村民连续自杀事件，52岁的李立文得救，31岁的村民小组长李祥和32岁的村民陈音富失去生命。同年9月15日，安徽一位农民

被证实由于对当地拆迁办法不满，在北京天安门自焚。

李昌平：我觉得一种情况是从90年代以来，农民生活的困境越来越严重，很多人找不到对于生活的希望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破灭了，或者说在挣扎的过程中看不到希望，生命对于他们来讲就不像其他的人那样有希望，他们是一种绝望的感觉，所以产生轻生的念头。贫困地区的自杀率比其他地区要高得多；还有一种是，死是人们最后的反抗，是用自己的生命来证明一种东西，或者说为证明一个东西，以死相拼。这些人实在找不到一个可以讲理的地方，只得用死来证明，反抗，希望能引起一点重视：原来我是这么死的，我为什么要去死。因为我活着我没得办法来讲，连被倾听的权利都失去了，只得用死来讲，希望社会能听到我的冤屈。

周原：贫困是现象，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杀的诱因，但不是根源。

李昌平：当然不止贫困。人有很多追求，当追求不能实现，成为泡影，对生命失去了信心，失去了希望，就很容易轻生。还有当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受尽歧视，或者权利受到了侵害，无法维权时，他为了证明我是对的，或者这是我的权利，你不应该拿走，他要维护他那一点东西，想找个地方去评理，去找回自己的尊严，但是又找不到渠道，那他就只能付出生命的代价，中国人往往用生命去换取一个道理，或者一个说法，很多农民有理无处讲才这样。

我在乡下工作的时候，也经常遇到那些用生命换取一个说法的事件，我特别尊敬那些用生命换取说法的人们，现在想到那些死者，心中就忏悔；在北京的时候，有很多的无助农民去找我帮助，有很多人我实在是无力帮助，我所能做的就是耐心



李昌平与农民

的倾听他们的诉说，尽量的安慰他们，让他们看到一些希望，但是还是有一些人死在了北京。

周原：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上海《申报》的记者秦理斋去世后，他的夫人为了子女在沪读书等原因没有回老家，在受到秦父多次严厉催逼后，带着三个孩子一起服毒自杀。舆论纷纷谴责自杀者，这时鲁迅写了《论秦理斋夫人事》，说到穷乡僻壤或都会中，孤儿寡妇，贫女劳人之顺命而死，或虽然抗命，而终于不得不死者有无数，但这些曾经上过谁的口，动过谁的心呢？所以鲁迅认为我们应该寻找自杀的根源，如果只是向弱者唠叨不已，那么他其实只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。现在在这么多的自杀中，你印象比较深的是哪些呢？

李昌平：比如说有的人跑到法院门口去自杀，用自己的生命告诉大家，法院的判决不公，如果公正的话，我怎么会去死。他只是用生命告诉别人一个道理。

周 原：这样的死有没有意义？

李昌平：有没有意义是另外一回事，那得看活着的人怎么看。就像一个孙志刚，他不能白死，如果我们活着的人漠视这些人用生命维护的权益，如果大家对此漠然，不起来伸张正义，那么他的死就没有什么意义。

周 原：一个孙志刚的死，换来了一个恶法的消除。但同样的问题要看我们从哪个角度来看，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，总是会有人牺牲？还是立足于生命本身，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是无可替代的？

李昌平：我记得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：《孙志刚替我而死》，对每一个付出生命代价的人，我们都不能漠视，那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，只有这样，他们

李昌平与孩子

